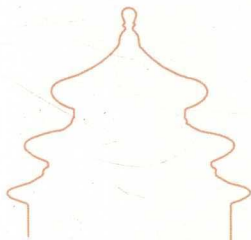


“新批评” 的中国化研究

张惠 著



20世纪初，“新批评”应“西学东渐”
之潮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学批评发生关联。
它不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而且引致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
转换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新建构。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BA109）、2016年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6B056）的阶段性成果。

“新批评” 的中国化研究

张惠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遵循理论分析与史料梳理相结合的原则,对“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展开纵向的历史研究,以表现出在历史的视角下“新批评”中国化的丰富性与立体感。同时,以“新批评”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为关切点,描述“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范式的差异与联系,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在接受“新批评”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揭示“新批评”的中国化给中国文学批评重建带来的意义与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张惠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667-1728-3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批评史-研究
IV. ①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4822号

“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

“XINPIPING” DE ZHONGGUOHUA YANJIU

著 者:张 惠

责任编辑:罗红红

印 装: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6开 印张:12.75 字数:243千

版 次: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1728-3

定 价:38.00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343(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luohh@hn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次

引言	1
----------	---

第一章 “新批评” 在中国的理论传播

一、“新批评” 在中国的直接传承	6
二、“新批评” 在中国的规模译介	15
三、“新批评” 在中国的系统研究	24

第二章 “新批评” 在中国的话语变异

一、本体论与主体论	34
二、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	40
三、结构原则与修辞手法	43
四、文本细读与感悟参与	49

第三章 “新批评” 与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

一、意义学：学术语言观的现代自觉	56
二、修辞学：语言修辞的现代更新	61
三、解诗学：古典诗词的现代解读	67

第四章 “新批评” 与中国现代文论的重新建构

一、现代新诗理论的构筑	82
-------------------	----

二、现代小说理论的建构·····	104
三、形式批评的发展·····	144

第五章 “新批评”在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价值判断：解构主义与“新批评”·····	163
二、审美坚守：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	176

参考文献·····	191
后 记·····	198

引言

20 世纪初,“新批评”应“西学东渐”之潮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学批评发生关联。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新批评”不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引致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新建构。因而,“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影响与接受,而是“新批评”的中国化。20 世纪末至今,研究“新批评”的中国化,不仅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影响研究的继续,更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当务之急,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实践范例。

研究“新批评”的中国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新批评”为何?也就是“新批评”是什么。在理论爆炸的 21 世纪,“新批评”已然不再“新”,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随着结构主义的浮出而日暮西山,但在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文论时,“新批评”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新批评”的内涵

在西方文论史上,“新批评”一般指涉的是 20 世纪 20—50 年代英美的一个文学理论派别,它得名于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一书。但实际上,“新批评”这个术语,本身的内涵十分复杂。但是,在西方文论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界定明确的“新批评”集团或流派。后来被学术界囊括入“新批评”集团的“新批评”家们,也根本无意于形成一个共同的流派,甚至认为自己根本不应被放入“新批评”的范畴。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就曾明言:“有一点需要指出——至少对我来说这极重要,即我并不认为新批评是个流派。与其说它是一个‘流派’,不如说它是过去(或现在)的一种被加以概括了的倾向。对我来说,存在于‘新批评家’中的根本性的不同之处如此之多;以至于很难把它想象成一个流派。”^①因而,“新批评”并不是一个有明确纲领、目标和组织的流派,而是一种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新的批评,之所以把这些批评家放入“新批评”范畴,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有着共同的倾向。沃伦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共同的倾向:“在我看来这种

① 沃伦. 什么是新批评? [A] // 史亮. 新批评 [C].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321.

共同的倾向似乎仅仅是下述信念：单纯积累与一首诗有关的资料并不能揭示它的本质和意义。对一首诗只是进行散文意释，也具有同样缺陷。我的陈述大致如下：这种倾向是要把握住一首诗的现实存在的本质与意义。”^① 沃伦所言的共同的倾向后来成为“新批评”理论的基点，即诗的本质和意义在于诗本身，而不在诗歌之外。

韦勒克(René Wellek)对这种共同的倾向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把这些批评家归为同类是因为他们一致反对之前美国批评的四大趋向：印象主义批评、人文主义批评、自然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他们全都排斥印象主义者付诸实践的那类比喻的、唤起记忆的批评。”^② 除此之外，“新批评派以不同程度的严厉态度异口同声质疑学院派学术研究的臆说和先入之见。”^③ 他们反对当时遍布各学院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粗暴统治，主张将文学研究拉回到文学本身。

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倾向，“新批评”集团的成员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着不同的文学观点，甚至有些批评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们共同表现出对印象主义批评、人文主义批评、自然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质疑，也表现出对文本研究的重视。这一派被学界命名为“新批评”派。“新批评”集团的成员包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燕卜苏(William Empson)为代表的英国“新批评”派；三四十年代以兰色姆为中心的“南方集团”(The Southern Critics)^④；四五十年代以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沃伦、韦勒克为代表的“耶鲁集团”(Yale Group)^⑤。除此之外，“新批评”还存在一些边缘人物，如伯克(Kenneth Burke)、布拉克墨尔(R. P. Blackmur)等。

从“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的角度看，“新批评”的主要理论特点表现在文本观、语义观、修辞观和细读法上。

“新批评”的文本观指涉的是由“语象”构筑的文本中心论。“新批评”认为，“语象”是构成文本的最小的结构单位，是指除了物象之外的语言中的

① 沃伦. 什么是新批评? [A] // 史亮. 新批评 [C].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321-322.

② 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 [M]. 杨自伍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46.

③ 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 [M]. 杨自伍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47.

④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美国的“新批评”流派，以兰色姆为中心，主要成员包括他的三个学生：退特、布鲁克斯和沃伦。

⑤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活跃于美国的“新批评”流派，以耶鲁大学为理论阵地，其成员包括维姆萨特、布鲁克斯、沃伦、韦勒克等。

“象”。在解读作品时,通过理解“语象”可把握作品的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新批评”构筑了文本中心论,兰色姆直接将自己所倡导的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批评称为“本体论”批评,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客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因此,文本中心论成为“新批评”的理论核心。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更是将文本中心论发挥到极致,提出了著名的“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说,斩断了作品与作家、读者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批评”是一种纯粹的作品本体论。

在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从文本中心论角度进行文学研究绝不只是“新批评”一家,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都做过尝试。但是从语义学角度进行文学阐释的,“新批评”算独树一帜。从整体上看,“新批评”始终践行语义结构本体论。瑞恰慈从语言出发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特征,他不仅重视文学语言的情感性特征,而且更加关注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含混性,因为文本是由具有多义性的语言构成,文学作品的本质就是语言多种含义相互交织而形成的“语义结构”。因此,“新批评”认为文本“语义结构”所体现出来的多义性、丰富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质。

“新批评”的修辞观主要指涉的是“反讽”“张力”“悖论”“隐喻”等范畴,这是“新批评”对现代修辞学的重要贡献,是对文学语言根本特性的总结和归纳。“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术,指的是说反话。“新批评”则将其视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瑞恰慈提出“反讽性观照”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布鲁克斯则认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①就是“反讽”。“张力”指的是诗歌当中由词的字典意义与延伸意义所产生的相互牵制、相互依托的关系。退特(Allen Tate)说:“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②这是文本的组织结构之一,也是文本的诗性结构之一。“悖论”本是修辞学中的一种修辞格,指的是“似非而是”的语句,在“新批评”这里变成一种诗学原则,布鲁克斯认为,诗的语言事实上就是悖论语言。最后一个范畴“隐喻”,指的是通过类比发现了物体之间局部的相似,于是产生一种类似奇迹的效果。“隐喻”是比喻的一种,“新批评”高度重视“隐喻”,认为“隐喻”是语言研究的一大特色。

“新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而批评的任务是对

① 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A]//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5.

② 退特.论诗的张力[A]//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7.

文本进行分析,这种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的方法叫“细读法”。“它是对作品进行耐心仔细地分析推敲,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①这是一种对作品作详尽分析和解释的批评方式,其操作过程大致包括:了解词义、理解语境、把握修辞特点等。

从以上的阐述可知,“新批评”的主要理论特点可概括为:它在文本观上坚持文本中心论,在语义观上践行语义结构本体论,重视语言研究,关注修辞学上的“反讽”“张力”“悖论”“隐喻”等范畴,并将其发展成文本的诗学原则,在批评方法上采用“细读法”,使其成为“新批评”阅读与理解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新批评”在英美文论界兴盛近三十年,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结构主义大师弗莱(Northrop Frye)出版了《批评的解剖》一书,在该书中,弗莱将数百部文学名著纳入一个宏大的文类模式中进行研究,此举标志着“新批评”以分析单部文学作品模式的极盛时期的结束。由此,“新批评”走向衰落。但是,美国解构主义大师利奇却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批评”不是走向衰落,而是进入第四个阶段——“惯常期”,时间应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他说:“新批评派的思想和方法已经广泛深入批评家的心中,形成了‘批评’的本质概念……新批评在50年代的‘死亡’标示出一种常规化了的‘永生’——这一奇特之举是当代别的任何批评流派无法实现的。”^②可见,“新批评”虽已衰落,但是,“新批评”所坚守的理论与方法影响了之后的各种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理论流派在“新批评”的理论烛照下进行各自的学术研究。不仅如此,“新批评”通过“理论旅行”,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

(二)“新批评”的中国化

中西方文论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存在两种理论发展方向,一是中国理论的他国化,一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经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论被忽略了,中国当前的学术界都是以西学的话语和规则来进行文学研究。曹顺庆先生说,中国文论患了“失语症”。针对这种“失语”的现状,曹先生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和“西方文论中国化”。

从20世纪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情况来看,有两种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实现了中国化,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种是“新批评”。马克思

① 史亮:新批评概述 [A] //史亮.新批评 [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52.

② 蓝仁哲.新批评 [J].外国文学,2004,(6):51.

主义文学批评关涉的是意识形态研究,“新批评”强调的是语言与审美研究。

所谓“新批评”的中国化,指的是“新批评”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使其成为适应中国的文学现实,并能充分言说中国文学现实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新批评”的中国化是“新批评”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必然结果。其必然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当“新批评”被翻译过来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初步地中国化,因为受翻译者的中国文化立场及汉语思维的影响,“新批评”的观念和术语在表现的形态上已发生了适应中国特点的初步变化,“新批评”已很难等同于其在英语语境下的“母本”。其次,“新批评”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被中国人接受的时候,必然会经历一个过滤、误读的再创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言说、解释必然会带有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这样,“新批评”就被打上了中国的痕迹,产生不同程度的中国化。再者,从中国的现实语境来看,“新批评”在20世纪20年代得以翻译与引进,并不是因为批评家突发奇想对西方理论产生了兴趣,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反思的结果,是要借此解决自己的话语问题,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来引进和开辟新的话语空间。

“新批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从初传到被接受,再到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都经历了一个环节——中国化。“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建有密切关联:一是二者都涉及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二是二者的理论起点与目的都是建构中国文论。

这些关联的存在表明,“新批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建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新批评”中国化的经验,可以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建提供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本书把“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作为研究和探讨的对象,希望通过对“新批评”中国化的经验总结,来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新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其思想方法对西方文学理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仍有深远影响,在后理论时代研究“新批评”的中国化问题,有利于纠偏中国文学批评对“新批评”的误解,正视“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为完善当前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学,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观念与范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第一章 “新批评” 在中国的理论传播

“近现代文学时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莫过于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学与以儒、佛、道为背景的东方文学之间的空前的接近、交流和融合，及其所促进的东方现代文学的诞生。”^① 在这种东西方文学的交融中，“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新批评”是20世纪影响巨大的文学批评理论，在20世纪前半期的英语世界风靡一时，在2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也甚为引人注目。“新批评”传入中国后，不仅在40年代被迅速地中国化，且一度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究其个中因由，除了“新批评”和中国古典文论在理论范畴上有某些同质性，较容易实现“新批评”的中国化以外，中国教育机构、期刊、个人等媒介对“新批评”的传播，也大大推动了“新批评”的中国化进程。

对“新批评”中国化的传播路径选择，拟从三个角度进入：一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实践活动，主要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慈和燕卜苏曾在中国执教，直接传播他们的文化思想；二是“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通过对译介史的梳理和中国学者对“新批评”的创造性翻译，考察“新批评”传播与接受的文化交流意义；三是中国学者对“新批评”的研究，阐明作为接受者的中国学者对“新批评”的理解、认同和拒斥。

一、“新批评” 在中国的直接传承

“新批评”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慈和燕卜苏曾亲身到中国的高等学府任教，通过教学的方式直接传播了“新批评”思想。瑞恰慈和燕卜苏的教学实践和文学批评实践，通过直接性传承的方式，改变了中国学者的文学观念，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理解”与“传播”：瑞恰慈在中国的思想传播实践及影响

瑞恰慈是英国现代文论家、诗人、教育家，是英国“新批评”的早期代表

^① 曾逸，中国现代作家与世界文学导言 [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4.

人物，他的批评理论对英美文学批评尤其是“新批评”派具有深远的影响。他早年在剑桥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时，开始创造性地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批评立场。自1927年起，他先后六次来到中国，致力于“理解”基础的中西文化沟通，终身“传播”其文化思想与文学批评观念，实践“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直接对话。

1. “理解”：“镜子两边的中国梦”

英美现代派文学大师艾略特曾写信给瑞恰慈，说西方人要理解东方思想，“就像同时要看到镜子的前后，不可能”^①。意思是西方人只可能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中国文化。瑞恰慈却试图移开镜子，充当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因为瑞恰慈“相信人类的基本统一，相信从柏拉图到我们时代的传统的连续性，相信最不相容的文明——中国文学与英国文明的交汇，相信古往今来诗歌的治疗效果和文明力量”^②。他相信，人类的文明只要经过沟通、交流，就可以达到相互理解的文化和谐与心灵和谐状态。

正是在“理解”意识的驱动下，瑞恰慈终身致力于中西文化交融的事业，他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他文化交融思想的试验田，是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迷恋。瑞恰慈的传记作家拉索说：“中国对他具有无限的魅力。这种迷恋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当詹姆斯·伍德高声朗读并让他关注‘中文所含的多重意义的潜能时’，当在剑桥大学的中国诗人徐志摩‘刺激起他对汉语的兴趣时，这种迷恋便开始了’。”^③1922年，瑞恰慈与奥格登合作写出他的第一本著作——《美学原理》，已经尝试用中国哲学解决西方文化的问题。1932年，瑞恰慈约请四名中国专家一道研究《孟子》文本，写就《孟子论心》一书。对瑞恰慈而言，此书的研究与写作不是为西方读者提供另一种儒家经典文本，而是探讨文本的多义性问题，反映语言译介交流的困难，同时又表明跨文化交流是可以实现的，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是可以达成的。

在这种对中国文化神往和渴望中西文化的“理解”的驱动下，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瑞恰慈先后六次来中国，或是旅行，或是讲学，或是

① 赵毅衡，瑞恰慈：镜子两边的中国梦 [A] // 徐葆耕，瑞恰慈：科学与诗 [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37-138。

②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M]，章安祺，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38。

③ John Paul Russo, I. A. Richards: His Life and Work,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405.

宣传“基本英语”，在中国居留时间共计五年半。^①

瑞恰慈第一次来华是在1927年，这一次的目的主要是旅游。瑞恰慈夫妇在北京待的这段时间，参观了清华大学，中国给瑞恰慈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促使其积极申请来华执教。他在1929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上回忆这次中国之旅时，动情地说：“两年半前，我曾对清华做过短暂访问，觉得清华皇皇学府，是一所优秀的大学，所以很想再来，但那时却不敢奢望这么快便被聘来与你们一道学习和工作了！”^②可见，1927年的来华，为瑞恰慈之后的传播文化与理念奠定了基础。

瑞恰慈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始于1929年9月13日，止于1931年1月14日。这是他传播其“新批评”思想的主要时期。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他在中国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执教，结识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他的直接传授，使中国学者直面“新批评”思想，影响了中国文论的话语形态。1929年9月16日，清华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是瑞恰慈到清华大学后开始上班的第一天。瑞恰慈在开学典礼上做了演讲。在演讲中，他说：“我是剑桥和清华二大学中间的一个使者！她俩干着同一的事业，负着同一的使命——谋‘国际谅解’和建设一个‘世界文化’的使命。……世界文化正在开始着互相接触。文化的沟通，是一个交通的问题，不过心灵的交通而已！……所以我到这儿，带着剑桥那边姊妹般的‘致意’，来献给你们，并且同时自己也负着重大的责任。我知道，在这儿我可以学很多的东西；我也知道，这儿有很好的教授可以指导我。”^③在演讲中，瑞恰慈重申了他想要努力沟通中西文化，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理解”与融合的理想。

2. 传播：从批评理论到文化思想

在致力于中西文化“理解”的促动下，瑞恰慈开始了在华的一系列思想传播实践，传播内容涉及批评理论与文化思想，传播方式分为文学批评的教学传播、文化思想的学术讨论和基本英语的社会推广等，通过教学、学术讨论、社会推广等方式，实现理论的传播与思想的普及。

瑞恰慈从1929年9月开始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授课。在教学上，当时中国大学的文学批评教学只侧重理论，而不研究各个理论所根据的作品与时代，导

① 赵毅衡在《瑞恰慈：镜子两边的中国梦》里认为瑞恰慈在中国居住了五年半，葛桂录在《I. A. 瑞恰慈与中西文化交流》中认为是四年半。瑞恰慈第二次来华将近两年，第三次将近三年，可见赵毅衡的说法更正确。

② 瑞恰慈，瑞恰慈的演讲辞 [N].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09-20 (4)。

③ 齐家莹，瑞恰慈在清华 [A] // 徐葆耕，瑞恰慈：科学与诗 [C].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24。

致文学教育传授的只是被抽象化和普遍化为某种类似教条的原则，而不是产生于具体语境和实践中的批评理论。瑞恰慈的批评理论，立足于作品，注重文化语境中的语义分析，提倡细读，这种切实可操作性的方法恰恰满足了那个年代学院对于文学批评的期待与要求。

从1929年至1930年，瑞恰慈所开课程有“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等，其中“文学批评”是三年级必修课，在外文系的课程体系 中占重要地位。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本学科讲授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其发达之历史。自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至现今，凡文学批评上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讨论之。”^① 瑞恰慈的“文学批评”课程主要是对世界文学大师的介绍，如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但丁、柯勒律治等。后来他还开设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两门课。1929年年底，他又增加了“基本英语”的教学内容。

瑞恰慈除了在清华大学授课外，还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讲“意义的逻辑”与“文艺批评”，并经常与北京大学同仁讨论《孟子》中关于心理的各篇章。通过在两个中国最高学府的教学工作，瑞恰慈把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艺思想传授给了中国的学生和同事，使中国学者开阔了理论视野，他的文学批评理论也随着他的教学实践开始在中国的大学得到了传播。

在学术思想传播上，瑞恰慈频繁地与中国学者接触，抓住一切机会与中国学者进行中国文化和文字的学术讨论。当时与他来往密切的中国学者有吴宓、冯友兰、叶公超等。

瑞恰慈与吴宓交往频繁，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如“中国文字学术研究”“中国文学现状”等。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瑞恰慈与吴宓多有交往，在清华大学开学的第三天，瑞恰慈就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现状等问题的看法与吴宓进行了长谈：“3—6点在 Winter 室中茶叙，与 I. A. Richards 教授谈。Richards 愿代授‘第一年英文’两小时，而宓则允助 Richards 君研究中国文字学术云。”^② 瑞恰慈非常关注英文教学法，10月29日“下午三时，Richards 来，邀至其所居寺中，茶叙。谈英文教授法，及中英文语句规例之比较。旋叶君至，谈至晚七时，始同步归。”^③ 在短短的两个 月里，瑞恰慈与吴宓接触甚是频繁。文化上的共同语言构筑了瑞恰慈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密切关

① 齐家莹，瑞恰慈在清华 [A] //徐葆耕，瑞恰慈：科学与诗 [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25。

② 吴宓，吴宓日记（第四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90-312。

③ Richards I A., Selected Letters of I. A. Richards, ed. John Constabl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Locket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08.

系，为传播他的批评理论奠定了基础。

瑞恰慈无疑是非常热爱中国的生活的，他在华的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学习、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他不仅在大学里传道授业，使中国学者近距离地了解到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而且虚心学习中国文化，从中国的文字学、哲学思想里获得丰厚的理论资源。这种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传播对中西文化的发展无疑都大有裨益。

(二) “教学”与“创作”：燕卜苏在中国的教学传播轨迹及影响

燕卜苏曾先后三次来到中国。早在1933年，燕卜苏在日本工作时，就曾在中国旅行、访问，虽然他没有写下一些旅行的文字，但他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①而他正式在中国教学与生活，则是后两次，一次是在战火纷飞的1937—1939年，燕卜苏与中国流亡大学在炮弹与跳蚤中共历艰辛；一次是在1947—1952年。这两次在中国居留任教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理论，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英国文学研究者和许多诗人”。^②

燕卜苏第一次在中国居留、教学，是从1937年8月到1939年8月，历时整整两年。燕卜苏何以离乡去国？主要原因是在1929年，当燕卜苏完成了英文本科学业等待麦德林学院的任命时，学院的勤杂工在他的宿舍里发现了避孕套，学院的院士裁决将燕卜苏逐出学院，不准其在剑桥居住。燕卜苏在后来的几年里，靠偶尔发表一些文章的微薄收入来生活。生活的困窘和处境的尴尬使他强烈地想离开英国。他曾申请到新加坡、开罗教学，没有收到回复，最后在恩师瑞恰慈的推荐下，到中国的北京大学教学。这也就是他在英国已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新闻，仍只身赴险来到中国的原因。

在1937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燕卜苏来到中国，他自我打趣地说：“我像一个幽灵一样来到中国。”^③随瑞恰慈夫妇经历了一场旅行后，他于10月19日赶去长沙迎接长沙临时大学的开学，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教学生涯。这次教学生涯被他自己形容为“伴着跳蚤和炸弹的野蛮人生活”。^④

① Douglas Kerr and Julia Kuehn,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Critical essay on travel writing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0.

② 王佐良、燕卜苏·奥登·司班德——读诗随笔之四 [J]. 读书, 1987, (4).

③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37.

④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82.

1. 燕卜苏在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由于战争的原因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正式开学。由于教学设施的短缺和空间的不足，校本部和理、工、法三学院设在长沙，文学院则移设到衡山南岳圣经学院分部。燕卜苏随学院抵达南岳衡山，与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同住一室。“他们非常享受地坐在宿舍的阳台上，互相交换着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轶事，燕卜苏甚至昵称金岳霖为老金。”^①

在南岳，住宿条件差，吃饭、生活的条件也相当艰苦，但燕卜苏却有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南岳的伙食较差，像很多西方人那样，燕卜苏一开始声称喜爱中国食物，但是当学院的厨师做一些确实难吃的中国食物的时候，他只好义正词严地声明他喜欢吃的是好吃的中国食物。南岳的冬天非常寒冷，房子没有壁炉和烟囱，职员和学生通过在金属盆里烧木炭来取暖，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段时间至少有四个学生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在待在山上的最后的时间里，燕卜苏得到了一间单人房，但是这使他更担心如果他窒息了，没有人在旁边对他急救，这就更危险了。他像中国人一样，穿上了衬衣裤，但这使他的毛衣在做任何运动时都显得太笨重了，甚至是打字和谈话。^②

与生活条件相类似，教学环境也是相当艰苦。最严重的一个困难是，人文学院没有任何课本。据李赋宁回忆：“因战乱，交通困难，图书尚未运到山上。燕先生仍教‘莎士比亚’，凭超人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③ 赵毅衡记述了在南岳山上，“三年级必修的莎士比亚课，连书本都没有，燕卜苏上课，凭记忆在黑板上默写了整出《麦克白斯》。据巫宁坤回忆，是整部《哈姆雷特》。据赵瑞蕻回忆，是整段《奥赛罗》。”^④ 燕卜苏的传记作家哈芬丹说其实燕卜苏手头还是有一本1850年版的莎剧的。燕卜苏自己写下过当时的情况：“一个仁慈的人借给我一本伟大的莎士比亚1850年作品，我很妥当地保存它，在南岳山上的时候变成了上课用的讲稿。”^⑤ 举出这个证据并不是为了缩小他的成绩，仅仅是为了保持事件的正

①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g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58.

②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g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61.

③ 李赋宁. 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④ 赵毅衡. 燕卜苏: 西南联大的传奇教授 [J]. 时代人物, 2004-11-16.

⑤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g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63.

确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南岳期间，燕卜苏和大学的教授们大多凭记忆上课。“赵瑞蕤先生说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苏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背诵整部经书授徒。”^①

在南岳的逗留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尽管有很多人认为依靠记忆来进行教学太不严谨了，燕卜苏却认为通过这种经历自己得到了很多——他的学生为他的专业、他的机智、他对待学生的平等态度所折服。同时，他跟他的同事也很团结，他经常认为南岳是他理想的学术园地。可怕的孤独和贫乏的供给，使整个学术团体有了对目标的特殊感受。尽管他们都是难民，但是他们把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定位为保持精神独立的国内领袖。就像冯友兰教授后来写的，“我们也经历了跟南宋王朝一样的命运，因为外敌的入侵我们转移到了南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棒的环境中，这儿有哲学家、作家和学者，全都住在同一栋楼里。这是一个历史的汇合的时刻，地理的定位，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使这个时刻令人无比激动。”^②

同时，就是南岳，燕卜苏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南岳之秋（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这首长诗忠实地传达了他在战时南岳的生活状况，也传达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前途的信心。

因日军侵略的炮弹已落到长沙，1938年3月，燕卜苏随长沙临时大学离开南岳，4月撤离到云南，这三个流亡大学重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为联大，在云南省会昆明落脚。然而校舍的不足使文学院和法学院迁往蒙自。

燕卜苏便随校来到偏远的蒙自。燕卜苏住在散乱但宽敞的一个传统的房间里，这儿靠近城市东边的城墙，只要走10步就可以去上课。燕卜苏说，“我住在一个类似马廄的地方，有很多蜈蚣和其他的东西”，“和教授们吃每个月12先令的伙食”。^③李赋宁回忆说，他就算看起来病得很严重，发了高烧，疲惫得要倒下去，也坚持来上课。^④当8月的炎热的暑假就要过去，文学院离开蒙自时，燕卜苏也趁暑假到了大理、丽江以及新加坡等地旅行，12月返回昆明。大学在12月1号开门，12月8号正式开学，校方决定这个学期要一直到1939年6月底，中间不能休息。校园里有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用作紧缺的宿舍。燕

① 赵毅衡。燕卜苏：西南联大的传奇教授 [J]。时代人物，2004-11-16。

②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g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67-468.

③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g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85.

④ 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 Among the Mandaring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86-487.